

独异性逻辑下高等教育的挑战与突围路径

张雅鑫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在高等教育中, 独异性正在成为新的评价与竞争准则, 并引发了“自我异化-教育暴政-内卷固化”的恶性循环。高等教育对独异性的推崇使受教育者自我异化, 导致高等教育从内在探索沦为外在表演。此异化被教育系统内化为“教育暴政”, 在“我能够”的积极话语下, 主体被迫进行高效的自我剥削。全体参与者对独异性的竞逐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创新停滞与内卷固化。为应对独异性逻辑的挑战, 高等教育需要实现重构。高校要引导学生回归存在论意义上的内在独异性, 重建以真实成长为核心的价值根基, 突破原子化的竞争窠臼, 在与“他者”、与世界的对话中构建共生共荣的独异性网络, 打破完美主义规训, 树立“足够好”的反卷理念, 珍视学生“未完成”的成长可能, 共同追寻高等教育的本真意义。

关键词: 独异性; 教育内卷; 教育异化; 教育暴政; 教育反卷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26)01—0069—10

当前时代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超文化和数字科技, 正通过协同发展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断裂性变化。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某种极端形态, 晚现代正在系统性解构现代社会所依赖的确定性和普适性等现代性基石。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等将晚现代核心特征总结为独异性, 将独异性明确定义为“增加原有事物内在厚度的自身复杂性”^{[1]14}。独异性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进程, 即“特殊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比拟性和优越性被期望、制造、积极评价和体验”^{[2]9}。独异性对晚现代经济、科技、劳动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如今的社会, 无论往哪个方向看, 人们想要的都不再是普通, 而是独特。不再把希望寄托给规范化和常规的东西, 如今的机构和个人, 其兴趣和努力方向都只是追求独一无二、追求独异于人。”^{[3]1}独异性社会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突破和创新, 但它也面临未知的风险。莱克维茨认为, “与工业

化现代相比, 晚现代是否确实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再一概而论”^{[3]341}。目前, 独异性社会正引发社会层面的承认危机、自我实现危机和政治危机^{[1]92}。长期以来, 高等教育植根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范式, 形成了一套以标准化、规模化、效率优先为核心的发展逻辑。然而, 随着独异性社会的崛起, 这种传统范式正面临挑战。独异性逻辑要求高等教育重新审视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定位, 回应社会对独异性、个性化和意义追寻的新需求。本文遵循“阐释独异性逻辑-剖析高等教育危机-重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思路, 旨在深入思考并厘清三个核心问题: 相较于现代社会, 独异性社会呈现哪些新特征; 在独异性逻辑冲击下, 高等教育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 如何重构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如何理解独异性逻辑

独异性是晚现代社会摆脱标准化、同质化逻

收稿日期: 2025-06-20

修回日期: 2025-0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RC010)

作者简介: 张雅鑫, 博士研究生, 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25-12-02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774.G4.20251201.1401.001>

辑后,在文化、经济、生活方式中呈现的整体特征,体现为社会对多元差异的包容与接纳。例如在设计与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小众设计酒店和手工定制产品凭借不可复制的叙事内涵与美学风格,帮助消费者追求具有辨识度的独异体验。在工作与职业层面,“斜杠青年”和“个人 IP”的兴起,标志着职业身份从稳定的归属转向对个人独特技能与才华的营销。在旅游与休闲方面,从打卡式游览地标到沉浸式体验,游客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感受。独异性逻辑正系统性重塑我们的消费、工作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维度,这使其成为定义晚现代社会形态的关键特征。然而,若将分析止步于此,我们便无法理解这一宏大逻辑是如何具体作用于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为阐述“什么是独异性社会”,我们必须引入更具体的分析维度,即作为教育赋值标准的独异性与作为主体叙事策略的独异性。

在教育领域,作为赋值标准的独异性体现为一种新的竞争规则与人才评价体系。它要求学生或者教师必须具备区别于他人的鲜明特质与卓越亮点。无论是海外名校申请中追捧的那些非凡成长经历,还是国内高校“强基计划”和“拔尖创新”对竞赛排名或重大社会实践项目的青睐,都表明教育成就的衡量标准正从达标转向独异。教育正将社会层面的独异性要求转化为一种新的赋值标准和筛选机制。作为主体叙事策略的独异性,是个体在社会和教育语境中主动建构自我独特性叙事,以摆脱群体标签束缚、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方式,本质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主动建构。比如社交媒体上的人设塑造,本质就是个体独异性的展示。每个人都通过精选的图片、文字和分享内容来构建与众不同的“自我品牌”。人们对“灵魂伴侣”的追求,也是将亲密关系从传统婚姻中剥离出来,将其视为两个独特主体间的精神共鸣叙事。

作为社会形态特征的独异性与作为教育赋值标准的独异性、作为主体叙事策略的独异性三者之间既有差别,也有联系。独异性社会形态为教育和主体提供了新规则;教育系统培养并筛选出符合独异性逻辑的主体;无数个体对“独特自

我”的追求,又反过来再生产并巩固了作为社会形态的独异性。正是通过这种区分,我们才能理解独异性社会作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系统,如何从外部结构到内部心灵,全面重塑我们的世界。

(一) 独异性逻辑的形成背景:“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

独异性是晚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晚现代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又被称为“后现代”“第二现代”,用来表述不同于 19 世纪的现代社会模式。通过强调“规范化、程式化和通用化”^{[3]27},现代社会的实践与话语体系得以形塑。莱克维茨基于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这五种社会元素解释了普适性逻辑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机制。在普适性逻辑统治下,“一切都是为了规范化和程式化,要将世界的种种元素都造成一样的,一种风格的,并且是平等的”^{[3]28}。现代社会的客体被塑造为标准化工业产品,主体被规训为合乎规范的社会角色,空间趋于同质化,时间被纳入科层制管理,而集体则演变为具有形式理性的组织形式。在此范式下,符合普适性范式的事物被赋予合法性并受到推崇。反之,任何具有独异性的人、物或实践,都会遭到排挤和压制,这共同导致了独异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边缘化处境。普适性规律的确立与现代社会理性的进程紧密相连。18 世纪后,现代社会在技术、认知与规范领域^{[3]26}实现了全面理性化。理性化强调客观性和可计算性,降低了现代社会的感性成分与情感依赖。而晚现代社会是一个情感社会,情感触动在整体上对独异性社会逻辑有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没有情感触动,就没有独异性”^{[3]56}。

20 世纪晚期,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普适性规律的根基开始动摇,工业社会遭遇了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社会形态由此发生转型,其最终走向的是一个独异性占主导地位的晚现代社会。在这里,普适性规律已失去了传统主导权。莱克维茨认为,在工业化现代和晚现代之间发生了结构性断裂,主要表现为工业资本主义向“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转型^{[1]13}。相较于现代工

业社会,晚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认知资本主义的成型,二是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具体而言,以专利、著作权、网络流量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正取代传统有形资产,成为资本生产的主要形式。这些无形资产是凝结了文化意涵的知识产品。在认知资本主义语境下,有效性或功能性已不再是衡量商品优劣的主要标准,消费者愈发渴求能在伦理取向、审美表达以及叙事建构等方面承载情感价值的商品。正是在现代社会主导经济结构的产业由工业转向文化之后,商品才真正获得了情感上的吸引,独异性由此生成。这种“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创意劳动为核心的独异性经济。创意劳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活动,其核心是为消费者提供富含积极情感体验的产品。伴随文化商品的兴起,现代社会的标准化和普适性产品不再受到青睐。晚现代社会的重点不再强调产品的功能与属性,而是致力于为其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情感层面增强吸引力。

(二) 独异性逻辑的核心特征:文化化

文化化是独异性社会的核心特征。莱克维茨对文化的阐释以区分“广而弱”和“狭而强”的文化概念为基础。广义的文化被理解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与价值判断紧密相连。“在与价值有关的地方,才有文化。”^{[2]17}独异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赋予过程,这种赋值决定了哪些事物或人有资格被认为是独异性的。独异化的赋值与去值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某种事物被赋予价值,往往就意味着其他事物的价值被剥夺了。“而价值赋予与剥夺就是文化内涵的产生或失去”^{[1]15},莱克维茨称之为文化化。文化化现象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运行逻辑正日益被文化符号、意义生产和身份认同所重构。在这一转向中,独异性社会的赋值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传统社会形态中,价值判断往往依赖一套明确且普遍适用的标准,例如生产效率、学历证书或职业地位,它们构成了评价人与物的稳定尺度。然而,进入独异性社会后,价值的来源转向感知上的独特性、情感层面的共鸣能力以及文化语境中的显著性。事物的意义不再

取决于普适性规范,而是植根于其特殊品质与差异化的表达。换言之,晚现代社会的赋值逻辑本质上是追求差异化。个体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人生路径与外在评价,而是积极寻求那些具有独特体验和不可替代价值的存在形式。其结果是那些成为独异性的事物得到推崇;“那些不能、不愿或不被允许独异化的事务。他们会被贬低,待在暗处没人看见,或者最多只能得到极少的认可。它们显得没有价值”^{[2]10}。

晚现代社会的文化进程呈现两种范式:文化本质主义与超文化^{[2]16},体现了差异化的独异性生产逻辑。文化本质主义体现为一种集体本位的独异性逻辑,其核心特征是通过建构文化同质性来划定并巩固群体的认同边界。超文化表征个体本位的独异性逻辑,它是晚现代社会文化化的主导形式。在超文化语境下,文化更多指向全球市场上流通的、多元且具个性化的文化产品。通过去事实性和去自然化,超文化为晚现代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差异化资源,以供其进行独特的自我建构。韩炳哲(Byung-Chul Han)认为,超文化剥夺了世界的“肃穆单一”,“深厚积雪覆盖着地面”的虚空被符号、形式和图像的超空间取代^[4]。超文化带有自由主义特质,借助数字网络加速了晚现代社会的独异化进程。它激发了个体的个性化发展,让主体能依据价值偏好构建多样的身份特征。以去中心化为核心属性的超文化凭借海量符号、风格与叙事的流通构建文化生态。这种流通会带来双重影响:一是打破传统稳定的价值体系,让文化价值陷入快速迭代的动态过程;二是重构价值赋予机制,价值越来越依赖个体情感偏好与审美驱动的瞬时判断。于是,一个通过不断更新来维持影响力的高度稳定的价值体系得以形成。

(三) 如何理解高等教育中的独异性逻辑

莱克维茨将独异性社会的核心逻辑概括为“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1]14}。这意味着独异性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将不再满足于达成一般性标准,转而追求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事物。受独异性逻辑支配,高等教育系统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从对普遍性的推崇转向对独异性的追

求。独异性本应是多元存在价值的体现,但在现实中却被简化为新的竞争资本。当独异性成为竞争手段时,高等教育关注的不是受教育者的本真,而是人的工具价值。当代高等教育对独异性与个人成功的过度绑定,导致主体为证明自身独异价值,不得不依赖外部认可来锚定自我价值,追求独异逐渐成为迎合他人期待的表演。当学生的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外界认可之上时,个体就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内卷竞争。为保持独异性,个体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身份标签,这导致人的倦怠与焦虑。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师与学生都被卷入到独异性的竞争体系中去:大学通过制定特色化的发展战略争夺资源,进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教师通过申请国家课题来满足职称评聘需求;学生通过积累差异化的学习履历建构竞争优势。独异性逻辑下的高等教育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在形式上追求创新和个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受制于新的标准化评估体系,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的同质化”悖论。“一个人要成为学者,不只要符合普遍的要求,并且学术界还期待这个人能有独异性。”^{[1]15}

独异性社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体系构建了评价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强加给高等教育,促使高等教育以此来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依据。这种独异性并非自主生成,而是被资本、技术和社会评价体系所共同定义的。高等教育的独异性竞争呈现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在学历层面,从普通本科到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构成了价值递增的独异性光谱;在科研成果方面,发表普通期刊论文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有巨大差距;在研究项目层次上,从普通课题到国家级重大课题的跃迁标志着学术资本的质变。独异性积累机制驱动学术主体持续追求更高层级的符号资本。唯有凭借这些获得学术场域普遍认可的独异性标识,研究者才能有效确证自身学术价值,赢得专业共同体认同,进而实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数字技术使独异性的呈现日益可视化,个人的生活轨迹与学业成果被数据化,这为个体间的比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独异性社会价

值体系的流动性与短暂性持续冲击个体自我认同。当自我价值完全受制于外部评价时,个体便易陷入存在性焦虑:一方面,独异性竞争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学生需追赶永无止境的标准;另一方面,学生难以获得持久的价值意义,这会滋生虚无感,使其身心倦怠。莱克维茨警告我们,“晚现代文化向个体许诺前所未有的主体圆满,并暗示个体有权实现这一点,却又总是让这种圆满如镜花水月,个体的现实生活——除了某些特定的高光时刻外——其实无法企及”^{[2]122}。

二、独异性逻辑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伴随独异性社会的来临,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莱克维茨指出了独异性社会的消极特征,即“现代社会结构转型所固有的社会不公和文化上的不统一、不可规划的赋值和去值动态、正负面情感的释放,这些都会让一些人念念不忘的理性秩序、公正社会、均一文化、稳定个性之类的构想显现实质:终究是怀旧”^{[3]349}。独异性逻辑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体现为“自我异化-教育暴政-内卷固化”的恶性循环。当社会无限推崇“独一无二的自我”,并将其简化为可被展示、衡量的“符号资本”时,追求独异性便从内在的探索异化为外在的展示。这种对“被认可的独特性”的追逐,使主体与真实的自我相疏离,此即为自我异化的开端。这种个体异化在系统层面催生出“教育暴政”。于是独异性不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而是被个体内化的无形规训,迫使学生自发地将外部竞争标准转化为严苛的自我剥削。而这种暴政又必然导致教育内卷的固化。当所有参与者都被迫在同一套单一化规则下进行同质化的自我优化,且资源始终有限时,竞争便不再是创造增量价值的创新之举。最终,这三者构成闭环:内卷的加剧使个体更加依赖并服从于制造差异的“教育暴政”;而为了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系统中生存,个体又不得不更深地自我异化,将自己工具化为符合评价标准的商品。这个闭环不断自我强化,消耗着教育的本真价值与个体生命能量,这正是独异性逻辑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严峻挑战。

(一) 自我实现的教育异化

在独异性社会语境下,个体对成功自我实现的追求日益强烈。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再局限于契合共性规范,而是转向能否深度发掘自身特质,并将其有效转化为被认可的独异性价值。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要求受教育者持续积累独异性资本,将其塑造为具有辨识度的社会标识。近年来,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校毕业人数迅速增加,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之间、毕业生之间为争取卓越和独异性展开了激烈竞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在流动的晚现代社会中,成功的秘诀在于“做自己”,而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和别人不同成了受欢迎的特质^[5]。在独异性社会的价值体系中,高等教育成就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衡量学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如精英大学学历、博士学位、学术论文等已逐渐演变为特殊的独异性资本。受教育者通过积累这些具有展示性的学术符号完成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叙事建构。在独异性价值导向下,受教育者发展出表演性的自我实现模式,他们刻意展示那些令人向往的学术经历。通过维持这种学术可见度,每个人都试图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场域竞争中确立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然而,独异性社会所设想的卓越激情和独异的美好生活固然令人向往,但理论假设可能无法兑现为现实的承诺,大多数人注定无法实现独异于人的人生目标^[6]。独异性逻辑揭示了人们对稀缺资源的渴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只有少数人脱颖而出,大多数人将沦为牺牲品。“根据这种逻辑,各产品和生产者在教育和社会市场上‘自由’竞争,只有‘最好’的产品和最勤奋的生产者才能出人头地,而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不够努力,或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7]172}

后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将“成功的自我实现”建构为主导性的文化叙事,引导受教育者将独异性视为能实现的确定性承诺。这一符号秩序在赋予个体以“掌控自我”自由感的同时,也巧妙地掩盖了隐性支配结构。韩炳哲的社会理论表明,“你能够”甚至比“你应当”更具强迫性,自

我强迫比强迫他人更能带来明显的效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8]。自我剥削因内的自我驱动性,往往比他人剥削更有效率。“以成功和表演性自我实现为特征的晚现代文化是一种非常有雄心的自我文化。人们对它抱有最高期待,同时也对自己抱着最高期待,期望自己能实现最高目标。”^{[2]131}当受教育者没有发表高水平论文或获取精英大学学历时,他会不断进行自我剥削,因为独异性社会将失败归咎为个体“不够独特”。“在赢家通吃的经济环境下,今天的年轻人已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不落后于人,以期在毕业后找到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落后已经成为当代的罪。人应该渴望别人所渴望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和别人竞争。那些未能拔得头筹的人,往往会加倍努力,以确保自己不会在优绩阶梯上滑落太远。”^[9]在独异性逻辑下,失败不仅代表成绩差,更象征平庸,因为个体无法证明自己的独特性。随着学术市场的独异性标准被不断抬高,以绩效衡量个体价值的残酷逻辑被进一步固化。比如目前“博士后”经历几乎成为找到好工作的必需品,且博士后机构的名气和合作导师的声誉成为新的筛选标准。“非升即走”制度更是将这种高标准制度化,要求候选人在有限时间内达成绩效目标。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博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期刊等级直接决定其待遇。一位发表多篇顶刊论文的博士可能获得上百万元安家费和数百万元科研启动经费,而论文普通的博士仅能获得基本薪资。但其实,大多数普通人都无法获得独异性。独异性进程根本不是“个性解放”,其实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制造独异品的进程^{[3]339}。

(二) “积极性”背后的教育暴政

从表面看,以“成功的自我实现”为特征的独异性教育具有积极性,它不断鼓励个体进行自我审视,以获得快乐、享受、欢愉、兴奋的情绪体验。在积极心理学影响下,晚现代将积极的情感视为教育的核心意义。独异性社会将高等教育建构为情感劳动场域,学生和教师需通过持续情感投入来证明其价值。某种程度上,独异性回应了后现代个体对教育联结与意义的渴望,但也掩盖了

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剥削逻辑。学生为获得积极体验,不得不陷入持续加速状态:他们被要求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或者以更独特的论文获得认可。这场不断加速的教育竞赛,实质上构成了以“进取”为名的教育暴政。它不再依靠外在强制,而是通过将“成功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内化,驱使受教育者主动投身于永无止境的独异性追逐,并在其中持续消耗自我。当“凡事皆讲求创新、独异,并且对创新与独异的讲求实质上是以理性的方式强逼出明明不受掌控的事,那么在这样充满剧烈张力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会系统性地被迫成为不断遭遇失去与落败的失败者”^{[1][15]}。更重要的是,独异性的文化赋值具有动态性,昨天的独特可能今天就成了平庸。独异性教育让失败成为多数人的常态,因为没人能确保自己一定会在下一轮独异性竞争中成为成功者。

在传统社会中,教育的成功标准相对稳定,比如掌握知识、通过考试、获得文凭,即使个体在某些方面表现不佳,仍然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社会认可的基本水平。但在独异性社会里,教育的逻辑已发生改变。大多数受教育者将注定沦为“不够独特”的失败者。论文发表失败或博士延迟毕业通常被认为是缺乏能力或天赋的表现,这些负面情感可能会对学生造成影响。在积极性话语下,高等教育变成了肯定性教育,其所塑造的独异性主体也是绩效主体。为在不断更新的绩效体系中获得强烈的自我体验,作为绩效主体的学生不仅要与他人竞争,更需要持续与自己竞争。因此,他们力图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在独异性社会中,他者将逐渐消失,每个人都高度以自我为中心,只在乎自己的成败而不关心别人的死活。”^[6]莱克维茨认为,独异性社会中的个体正面临危机,所谓“个体”,是现代社会的一则神话。用独异化视角来看,这则神话就算没有被揭穿,至少也已被祛魅^{[3][339]}。通过自我剥削,高等教育消解了本应具有的批判性解放潜能。独异性的强化依赖教育的量化管理体系,“在量化学生所学知识和理解程度的过程中,学生自身及其所学必然被量化成一个数字。这种量化是评测本身

的核心,它将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会状况转化为易于测量和比较的数字和类别^{[7][121]}。这种量化逻辑与独异性社会的期待相结合催生一个悖论:个体对独异性的追求,往往只是在算法推荐框架内进行的有限选项,在本质上陷入了由他者定义的“独异性陷阱”,它反映出独异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教育奖励危机。

(三) 持续强化的教育内卷

在独异性逻辑下,高等教育竞争变成了无止境的内卷,竞争者永远处于不安之中。“生存不再基于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具备足够的能力,而是不断地受到质疑:如果一个人不赢,在几天或几个月内,他可能会被淘汰。”^[10]这种心理机制解释了为什么当今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也是最焦虑的群体。博士头衔或精英大学学历不仅是学术能力的象征,更是“智识精英”的身份标签。表面上看,独异性社会赋予高等教育以情感意义,高等教育超越了纯粹的谋生工具范畴,被赋予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价值。然而,这种情感意义的赋予,实则建立在文凭能兑换“独异性身份体验”的基础之上。一旦文凭的稀缺性在内卷中被稀释,它所承载的情感回报与身份认同便会迅速贬值,反而加剧了参与者普遍的价值不安与精神耗竭。独异性强调完美主义的教育理念,夸大了人的能力,内卷主体陷入“努力-短暂满足-更高标准-更加焦虑”的无限循环,最终被持续的焦虑裹挟。这种完美主义叙事巧妙掩盖了独异性社会中高等教育的不公。一旦未能达成理想目标,个体往往将失败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忽视了背后的结构性限制。在独异性主导的逻辑下,人们追求的是“更多的高等教育”,而非“更好的高等教育”。独异性遵循进步主义叙事,以制造精英形塑了高等教育的期待。在进步主义叙事的影响下,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工具性需求超过了对其内在价值的追求。在独异性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学位文凭成了分配财富、资源和工作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人们对高等教育寄予了极高期待,对成功的追求也逐渐走向极致,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内卷。

在独异性社会,教育的赋值和评价标准处于动态变化中。“我们必须学着把晚现代视为一种

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形态,它的特点就是社会阶层的升与降、文化的增值与贬值同时发生。”^{[2][8]}当顶级期刊成为发表的独异性追求时,那些普通期刊就会被去值。独异性教育制造了少数高被引学者和大量普通研究者,后者即使付出同等努力,也可能因缺少资源与人脉而被边缘化。随着高等教育内卷的强化,独异性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无论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个体或国家参与竞争,赢家的数量都是有限的。被视作伟大者与被视作平庸者之间的鸿沟将永远不可能弥合”^{[1][17]}。独异的本质注定了它无法成为普遍现象,只能是少数个例的标签。倘若一个社会试图在所有维度都强求独异,结果必然是将生存压力推向极致:个体需要时刻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全方位的独异性追求会让受教育者陷入永无止境的竞争焦虑。

当代高等教育不断灌输这样的认知——独异性即进步,只有拥有独异性价值才能获得赞美,其核心是让学生相信,多一分独异性价值,就离成功更近一步。这看似为学生勾勒了美好积极的愿景,实则将他们拖入了自我消耗的竞争。在功利性动机驱使下,高等教育的本真使命被异化。独异性逻辑天然推崇拔尖与差异化,那些凭借教育阶梯跻身中产知识阶层的群体往往会被这一逻辑辩护。他们动辄以“优胜劣汰”的竞争话术将内卷背后的残酷竞争合理化,忽视了不同群体的发展差异与公平诉求。但事实上,在独异性主导的教育内卷中,没有真正的赢家。精英群体需时刻维持独异地位以防被替代,普通群体则在价值否定中消耗自我。独异性是一种暴政,它不仅导致高等教育陷入工具化困境,还让高等教育深陷内卷漩涡。

三、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独异性的挑战

为应对独异性挑战,高等教育需通过三重转向实现范式革新。其一,价值层面需打破工具理性主导的竞争逻辑桎梏,转向存在论意义上的内在独异性追寻,助力学生重建以自我成长为核心的价值坐标系,摆脱对外界评价与功利目标的过度依附。其二,关系层面需跳出原子化的自我优

化误区,摆脱孤立追求独异的局限,在与他人、社会及世界的持续互动对话中,构建彼此成就、共生共荣的共生型独异性。其三,评价维度需主动打破“完美主义”的规训枷锁,倡导并培育“足够好”的教育反卷理念,正视并承认“未完成性”的积极价值,与学生共同构筑以“美好成长”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本真追求。

(一) 重塑内在独异性的价值根基

在独异性成为主导社会逻辑的今天,高等教育的重构并不是去否定独特与差异的价值,而是实现核心命题根本性的价值转向:从“凭借独异性来证明人的价值”转向“人的存在本身即价值”这一原点。当前高等教育体系所倡导的独异性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独异性,它鼓励学生将自身打造成标新立异的产品。这种独异性非但不能通向真正的自我实现,反而将学生卷入不断自证价值的焦虑。从存在论角度审视,独异性具有内向型特征。理想中的高等教育独异性不应该关乎外在的指标与认可,而应指向主体对自我本质、内在召唤与生命本真的探索。内向型的高等教育独异性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我是谁”以及“我如何与世界连接”的持续追问。当高等教育能够停止鼓励学生用独异性向世界辩解“我值得存在”,转而引导他们确立以“存在本身”作为意义根基时,独异性的价值根基就得以重塑。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集体追求与实践,而存在论关注的是脱离绩效后,人如何真实地存在并安顿自身。将独异性置于存在论框架下,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目标需要从培养“值得拔尖的优秀人才”转向滋养“能够自主构建有意义生活的完整的人”。独异性不再是用于竞逐的筹码,而是每个独特生命体在真诚的生活与创造中所必然呈现的可能性。想要重塑独异性的价值根基,高等教育需要打破独异性与竞争性深度绑定这一现状,跳出“以竞争定义独异”的认知窠臼,将价值回归到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上。价值理性的独异性终极指向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指的“本真性存在”。它要求个体脱离外部评判标准,转而以真诚反思与生命实践为路径,直面自身的可能性与有限性。这不是孤立的

自省,而是在与他者、世界的持续互动中生成属于自身的、不可替代的生命意义。这种意义的获得缘于对自我生命的深刻体验。高等教育需要重新发现并承认“平庸”。此处的“平庸”并不是才能的缺乏,而是不被竞争逻辑所束缚的从容。当高等教育能肯定“平庸”的重要性,我们才能让每个生命无须通过战胜他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与价值。

作为人类最高层次的教育形式,高等教育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它在本体论层面蕴含着不可预设、难以被定义的内在价值。而每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会在此过程中收获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与成长感悟。作为批判性的教育哲学,内在独异性旨在凸显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其内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内在独异性植根于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一种本源的存在。它承认每个学生都拥有不同的心智结构、生命阅历与价值关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成为某个领域里“最好的 1%”,而在于是否最大限度激发了自身潜能,以及以独特方式回应了生命历程的重要问题。独异性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成功不应以培养出多少同一类型的精英来衡量,而要看受教育者是否找到了自身人生轨迹。

在内在独异性视角下,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实现从“被规定的存在”向“可能的存在”的转变。在独异性社会语境中,学生容易成为被外部标准所定义的客体。高等教育应当打破这种物化认知,帮助学生意识到自身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本质上,高等教育的内在独异性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回应了一个根本的高等教育伦理问题:高等教育的终极目的究竟是教会学生竞争,还是培育充盈、自主、能够享有并创造美好生活的人。前者将高等教育简化为生存策略的训练,外在性的独异性或许能生产出更高效的“竞争者”,却可能引发教育内卷与倦怠。后者重申了高等教育作为伦理事业的根本属性,强调灵魂的共鸣与心智的解放。

(二) 建构共生型独异性

为应对独异性社会的挑战,高等教育需要建

构新的共生型独异性。传统的教育独异性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不仅将他者视为主体的对立面,还不断强化主体的自我优化与剥削。共生型独异性不是封闭的自我指涉,它本质上是追求向世界敞开的、充满回应性的生命姿态。它诞生于主体与世界的积极对话之中。个体唯有通过差异的碰撞、对他者呼唤的真诚回应,才能确证其不可替代性。为此,受教育者需要超越自我优化的狭隘逻辑,不再将自身视为需要迎合外部评判标准的产品,而是作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行动者,在与知识、与他者以及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确立存在价值。共生型独异性的核心在于实现从“自我优化”到“世界关切”的转换。当衡量独异性的标准不再是比别人更优秀,而是对世界更有意义时,个体就不必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消耗与否定自我。具体而言,转向共生型独异性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引导学生跳出自我表现的陷阱,转而投身于构建自身与世界的意义联结中。学者的真正独异性从不源于顶刊论文的发表数量,而是植根于他是否以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回应了某个真切的时代议题。高等教育作为独异性生成的关键场域,需要用“世界导向”取代“自我导向”的成长理念,将学生置于更广阔的意义网络中,建构学生与真实世界的联结。传统观念将独异性视为静态的“拥有”,比如我拥有某种才华、某种特质,因此我是独特的。这种观念容易导致独异性的物化。而共生型独异性则将独异性理解为动态的“生成”与“行动”,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独异性的建构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对分数、论文等量化标识的过度依赖,转向对学生“回应世界之能力”的培养与确认。

共生型的独异性指的是在高度互联的世界里,个体或机构在发展成为独特自我的过程中始终意识到并致力于与更广阔的社会、自然和知识生态建立积极、互惠的联结。其独特性不是通过排斥或压制他者来实现的,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协作中得以生成和彰显。共生型独异性的建构,要求高等教育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其评价体系与育人目标,这并不是否定卓越与创新的价值,而是对“何为卓越”“何以创新”进行深刻的哲学

反思与重构。

在这个以优绩为导向的世界里,学生总是在与他人竞争,试图分清谁才是真正的胜者。传统的卓越是筛选式的,本质是通过比较和淘汰来确认少数人的优越性。但真正的卓越应体现为一种能与他人、与社会建立良性共生关系,并在这两种关系中持续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共生型独异性本质上是深刻的关系性存在,它从根本上重塑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联结方式,将原本紧张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富有创造力的共生关系。在传统竞争范式下,他者永远是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和需要超越的对手。我的独特必须通过你的普通来证明,这种思维将教育异化为一场零和博弈。韩炳哲的社会哲学高度肯定了他者之于缓解绩效社会中个体倦怠的重要性,认为排斥他者的个体“无法产生自我价值感。在这方面我必须依赖于作为奖励机关的他者,它喜爱我,赞赏我,认可我,并且看重我”^[12]。而共生型独异性为高等教育揭示了全新的存在方式:他者不再是我的威胁,而是我认识世界、确认自我的重要维度。

(三) 探索教育反卷的可能性

独异性社会的完美主义理念强化了教育内卷。学生不仅要优秀,更要成为独一无二的天之骄子。这种理念将教育的成功窄化为单一的、通往金字塔尖的狭窄通道,制造了“不完美便意味着失败”的集体焦虑。作为对独异性价值的深刻反思与更新,阿夫拉姆·阿尔珀特(Avram Alpert)在《反卷社会》(The Good-enough Life)一书中提出了以“足够好”为特征的反卷教育理念,精髓在于坦然承认并接纳人类能力、时间与资源的有限性。它并不是提倡平庸或“躺平”,而是对“何为优秀”进行价值重估。“足够好的生活接受人的缺陷,承认我们的优秀终归是有限度的。然而,正因为这些缺陷,它要求人人都能过上美好与充足的生活。因为世界是足够好的,我们对彼此也应该做到足够好。但这并非要投降,而是要呼吁将世界重新想象为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充满了意义、资源与创造力的地方。”^{[11][43]}

“足够好”的教育反卷理念从根本上消解了教育中“赢家”与“输家”的二元对立。教育的成

功不应以少数人的脱颖而出和多数人的陪跑为代价,而应致力于让个体都能达到人生“既美好又充足”的“足够好”状态。这要求高等教育体系从筛选与淘汰转向支持与成就。“追求足够好”这一世界观会提醒我们,不要苛责自己,没有人是完美的。而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对伟大的向往与现代经济竞争压力所主导的世界里,没有人能达成绝对意义上的“足够好”^{[11][265]}。为此,高等教育需要拒绝将完美设为唯一目标,转而追求在现实条件下可实现的优秀。它不再追求将每个学生都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是致力于培养能理性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完整的人。这样的人能认知并接纳自身的局限,同时也能在自身的禀赋与兴趣范围内实现自我发展,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作为致力于人性启蒙、升华与解放的伦理事业,高等教育应该警惕独异性。美好生活不在于对独异性的追逐,而在于对生命限度的认知与接纳。当前教育场域中弥漫的内卷焦虑,其根源并非努力本身,而是被异化的竞争逻辑。它驱使无数个体进行没有终点的自我证伪。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必须通过接纳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帮助主体从必须独特的焦虑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人的真实需求与内在成长。这要求高等教育建立新的评估标准。这样的标准促使受教育者既要看见世界的美好,也要接纳其中的不完美;既要追求充分发展,也要尊重自然限度,承认世界的美好,“追求足够好的生活,则是要对我们身上、其他人身上、我们的社会中以及我们的自然界中何为美好、充足与不完美,予以重新评估”^{[11][9]}。

当高等教育成功传递这样的世界观时,个体便能从“必须独特”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社会也将摆脱“内卷式”竞争的内耗,最终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性生态,让每个人都能在接纳有限中活出属于自己的“足够好”的人生。这正是高等教育在反内卷时代赋予个体与社会的终极价值。高等教育的成功不应被狭隘地等同于外在成就,而应包含个体的内在成长与幸福。一个能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并积极面对生活的人,同样是成功者。当社会能容纳不同的生命轨迹,并

承认每一种努力的价值时,高等教育的独异性危机自然会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 [1]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哈特穆特·罗萨.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社会理论能做什么? [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 [2]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M].巩 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 [3]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M].巩 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 [4] 韩炳哲.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95.
- [5] 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M].章 艳,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159.
- [6] 王建华.论教育的工业化与独异化[J].高校教育管理,2025(4):39-47.
- WANG J H.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ingularity of education[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5 (4): 39 - 47. (in Chinese)
- [7] 韦恩·欧.天生不平等——美国的应试教育与社会分化[M].张 凌,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
- [8] 韩炳哲.爱欲之死[M].宋 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5.
- [9] 迈克尔·罗斯.学生简史:理想教育何以成人[M].孔祥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153.
- [10]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M].李小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121.
- [11] 阿夫拉姆·阿尔珀特.反卷社会[M].李 岩,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
- [12] 韩炳哲.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M].李明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58.

(责任编辑 潘亚莉)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singularity

ZHANG Yax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n higher education, singularity is becoming a new criterion for evaluation and competition, triggering a vicious cycle of "self-alienation—educational tyranny—involution and solidification". The emphasis on singularity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led to the self-alienation of learners, reducing education from an intrinsic exploration to an external performance. This alienation is then internalized b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a form of "educational tyranny", where individuals, under the guise of the empowering discourse of "I can", are compelled to engage in efficient self-exploitation. Ultimately, the collective pursuit of singularity inevitably results in innovation stagn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logic of singularity, higher education must undergo reconstruction. At the value level, it is essential to transcend the constraint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guide students back to the ontological sense of inner singularity, reestablishing a value order centered on genuine growth. At the relation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free from the atomized competition paradigm and construct a symbiotic network of singularity through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and the world. At the evaluation level, it is crucial to dismantle the discipline of perfectionism, embrace the anti-involution concept of "good enough," cherish the potential of students' "unfinished" growth, and collectively pursue the authentic mea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singularity; educational involution; educational alienation; educational tyranny; anti-involution in education